

教育生涯漫談 (五)

劉季洪

江蘇教育廳改爲第四中山大學區教育行政院後，內設高等教育、普通教育、擴充教育三處，人事隨之而多變動。原任第一科長鄭宗海回浙江任省立女中校長，第二科長孟憲承留任秘書長，第三科長沈履改任省立南京中學校長，第四科長程時燧改任普通教育處長，第五科長俞慶棠改任擴充教育處長。督學陳鶴琴回大學任教，汪懋祖出任蘇州中學校長，周宣德回書局工作。我因在南京正任黨務工作，則留京主持一省立社教機構。

接辦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館

我到廳初期被派接收南京省立教育機構，其中有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館一所。該館位於秦淮河東岸在大中橋及復成橋之間，原爲前清上海道蔡氏所經營的韜園故址，因虧欠公款沒收收入官。秦淮河流南京城內以此處最爲寬闊，兩岸多爲田園，垂柳成蔭，更增景色。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前，秦淮河爲城內著名遊樂區，每晚遊艇雲集此間，歌聲徹夜不絕。革命軍到後加以取締，方得恢復平靜。

江蘇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館自民國元年就開始籌備，由盧殿虎主持。選定韜園爲館後，增建房屋，購置圖書及展覽設備，民國四年籌備完成，館長由省長公署擔任教科長的濮滌兼任。我在接收各省立教育機構時，發現此館環境及設備均多優點，但工作似未積極推展。當教育廳改組時，張廳長知我不能離開南京，相商之下，就決定在七月間派我接辦此一社教機構。

談起社會教育，本是各國教育設施的重要一環。我國自從有史以來，

歷代盛世都很注意社會教化的問題，內容雖以倫理道德爲主，但亦兼及國民生計。我們現在就禮記及其他古籍所載，還能看出古時教化人民的一般情形。及至晚清末年海禁大開，外侮迭至，有識之士咸認救國圖強，必須廢科舉，興學校，除正式學校外，也注意到社會教育的設施。不過當時所提倡的社教，以通俗講演及補習學校如簡易識字學塾等爲主。

民國成立後，政府及民間對社會教育更爲重視。民國元年臨時共和政府教育部，內置社會教育司與普通教育及專門教育兩司並列。就世界各國教育行政制度來說，中央政府教育機關設置社會教育主管單位，實以我國此時爲最早。至於民間熱心提倡社教的人士，在清末民初爲數甚多，但其中以江蘇武進吳敬恒（稚暉）及伍達（博純）兩先生爲最著。

吳稚暉、伍博純熱心社教

吳稚暉先生對學術文化有多方面的貢獻，他早年提倡社會教育之力，以及以後發生影響之大，更非他人所能及。他嘗說：「知識之輸入有兩途：一爲對人生最不可闕的知識，又幾乎爲全世界人類普遍所應知的事物，可以編成系統者，則輸之以學校教育。二爲各適乎四週圍的現象，又四圍現象所隨時變動呈露的事物不能悉循系統者，則輸之以社會教育。」他認爲無論如何文明的國家，學校教育雖已興盛，但仍不能不注重社會教育。何況我國在民國初年國人多數未受教育，更不得不用社會教育來補救。他對實施社會教育的方法也有說明：「用口耳交涉，效大而力小；用筆目交涉，效薄而力大。」例如補習學校及通俗講演等，教者聽者口耳相接，效

果當可較大，但受教的人無法太多。如用文字傳播，以目閱讀，印象較難深刻，但影響的範圍則可較廣。他主張兩種方法都要應用。

吳先生對他所主張的兩種社教方法都曾親自盡力推行。在民初出版的通俗教育研究錄上，有他自己在上海新舞台手擊扇鼓，用唱詞來對民眾作用注音符號來幫助。在他所寫「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」和「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」兩篇大文章中有詳盡的說明。所以民國元年國父任臨時大總統時，就以統一國語一事囑付與他。民國二年二月全國讀音統一會開會，吳先生擔任議長，歷時三月，制定注音字母，審定常用讀音。民國六年又手編第一部國語字典，奠定推行國語的基礎。以後教育部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，他擔任主任委員的時間為最久。現在我們都知道注音符號對我國普及教育統一國語影響之大，就可想到吳先生眼光所及是如何的遠了。

伍博純先生早年在地方從事教育工作，宣統年間曾至日本考察學務，見彼邦明治維新，國富民強，應歸功於教育；而學校教育之外，又多得力於社教事業的配合。於是民國元年他就任上海組織「中華通俗教育會」，編印通俗教育研究錄，並籌組通俗教育用品製造所。影響所及，各省亦紛紛成立通俗教育會，共達二百餘處，分別舉辦補習學校、通俗圖書館、通俗講演，以及發行白話報，改良戲曲唱本等。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種通俗教育制度，以補救學校教育的不足，可惜他為推行此事，積勞成疾，竟於民國二年九月以三十四歲壯年病逝。我在民國十六年主持江蘇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館時，編有民衆教育月刊，曾為伍氏刊行專號，詳述其倡導通俗教育經過，並摘錄其重要言論，以資紀念。

民國初年的通俗教育運動全賴熱心教育的人士義務支持，伍氏去世以後，失去推動重心，各地亦因缺乏固定人力財力，事業無法持久，此一運動在短期間就趨式微。江蘇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館的成立，事實上也是受這通俗教育運動的影響，但因江蘇教育經費較為充足，創辦此一公立機構，遂可長期維持。

多元化社教活動廣受注意

我在十六年接辦館務時，館中設有圖書室、博物陳列室、美術陳列室、講演廳、體育場等。接辦後加以改組擴充，另增加教導、編輯、研究等部門。並規定圖書、科學、藝術各部門除注重館內閱讀展覽外，均加強館外推廣工作。當時館內陳列物品採用購置、徵借、自製各種方法，力求充實，並經常更換。自製部份例如雇用無錫惠山擅長捏製泥人的技工，來塑製各種有教育意義成套的模型，生動醒目，深受民衆歡迎。至於教學及表演等活動，盡力配合男女老幼不同需求，隨時舉辦各種講習會、教學班等，並邀請各藝術音樂團體經常前來表演。如田漢等組織的南國社在初期尚未左傾前亦曾兩次來館表演。當時南京除省立國學圖書館及市立圖書館外，並無其他社教機構，因而本館多元化的活動引起廣泛注意，每日參觀民衆絡繹不絕。館中編有民衆教育月刊，將本館設施向各方報導後，各省教育人員常來參觀，並有時派人到館實習。不久政府積極推行社會教育，為求與民衆學校，民衆讀物等名稱一致，將通俗教育館改稱民衆教育館，且列為推行社教主要機構之一。在以後數年中各省市相繼設置，發展甚為迅速，至民國十九年度，全國已有民衆教育館六百四十五所，其中並有私立十六所。私人設置最早的是江蘇鈕永建先生。鈕先生任國府建都南京初期任江蘇省政府主席，每日早晨常在本館前體育場附近騎馬，因而明瞭館中情形，認為此種設施應普遍推行，遂計劃在其家鄉俞塘由私人籌設一所，並曾約我前往參加規劃。後鈕先生因公至河南洛陽暫住，又發起設置中原社會教育館一所，可見其對此機構的重視。

赴日本考察教育

十八年暑期我奉派至日本考察教育，歷時月餘，特別注意社會教育設施。當時前往日本甚為簡便，無需護照簽證等手續。中日間有日輪船公司的新式客輪上海號與長崎號兩艘，自滬開行，一晝夜可抵長崎，再駛神戶，改乘火車而抵東京。過神戶時曾遇申報記者黃天鵬及時報記者戈振青二君，並共同留影。不意五十年後黃君發現舊時照片，並刊入其著作中，以

為紀念。

日本自從清末中日、日俄兩次戰爭勝利後，又在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坐收漁人之利，國勢日強，更引起其積極向外侵略的野心，而其對象即為我國。其政府大力推行軍國民教育，培養國民忠君愛國精神。教育設施採取高度集權制度，各級學校教育內容及訓練方法，甚至學生制服及女生髮型，皆遵照政府規定，全國劃一。在社會教育方面，小學畢業生未能升學者均須接受職業補習教育，未達兵役年齡的青年均須接受青年訓練所的軍事訓練。職業補習學校及青年訓練所通常附設在中小學內，行政工作由學校校長兼任，補校教師由學校教員或專業人員擔任，訓練所教官則由在鄉軍人調充。因此各校長工作極為繁重，據稱在校時間每日常達十六小時，其刻苦精神頗為難能。

在日月餘，隨處見其侵略我國的野心昭然若揭，例如其本國地圖及世界地圖竟將我東北、內外蒙古及福建與其本國繪製類似顏色，以示此數地區已為其囊中物。又在名古屋附近部友地方見有專為訓練屯墾人才的場所，參加人員自耕自給，暇時則研究我國東北地區的氣候、土壤等生活環境，以作將來長期移民準備。這種種情形令人觸目驚心，我回國後曾為文詳加報導。

日人推崇我國社教機構

日本朝野上下既早具對我侵略野心，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十七年全國完成統一，目睹我國新興氣象，深為嫉視。在其教育刊物上多次敘述我國教科書宣揚民族精神，對彼必將不利。關於我國社會教育發展情形，彼邦教育界人士亦頗注意。據林本教授在其所寫「日本社會中心教育與晚近教育趨勢」一文中，曾稱：

「東京大學名教授海後宗臣博士於戰前考察華北教育，鑒於我國民眾教育館或社會教育館之普遍設置，其所作為，一以民衆需要為依歸。此種進步作風，嘆為弗如，而足資日本借鏡（見海氏所著：日本教育之進展一九八至一九九頁）。休戰以後，日本政府頒基本教育法，而以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並重。厥後除學校教育法外，復制定社會教育

法，於是久被閒置之社會教育，漸受世人重視，創辦公民館為其中心機構，其所設施，蓋與我國民教館或社教館甚類似。積極推行，以期窮鄉僻壤普遍設置。據一九五四年之調查，公私立公民館已達三六、一六八所（內私立十所），其設率已達全國市町村百分之七十八，蓋以每町村至少設置一所為目標也。」

從林教授這一段記述中，可以看出我國過去的民衆教育館，在設施上是一種相當成功的社教機構，因而日本於戰後仿效施行，並大量推廣普及全國，其能切合民衆需要，可想而知。但在我國戰前蓬勃發展的民教館，於抗戰期間破壞無餘。台省於光復之初，曾一度設置省立及縣市立民教館十餘處，但不久又均停辦。直至四十二年始再籌設社教館十餘處，惟經費有限，事業難以開展。近年來政府重視文化建設，在各縣市修建文化中心，建築力求現代化。以後如能再加以注意延攬專才，充實內容展開活動，當可發揮更多的社會教育功能。

工作三年更覺社教重要

江蘇省政府原設南京，國府建都後省府於十七年遷移鎮江。省教育廳計劃在新省會創設一較有規模省立民衆教育館，特於十八年指定由我代為籌備。我調用南京館中部分同仁，經過將近一年時間，至十九年春季籌備就緒，定名為省立鎮江民衆教育館，館務仍由我兼顧，是年八月我赴美留學，始派他人主持。南京館務我臨行雖經請辭，但廳中指定館中秘書劉雲谷代理，兩年後方正式改派他人。

我自十六年從事民教館工作，至十九年出國前後三年中，由於各方對此設施反應熱烈，個人更覺社會教育的重要。因而出國後在歐美各國隨時留意其與我社教相似的成人教育，並曾分別為文予以介紹。以至此後至教育部擔任社會教育司長及在各大學講授社教課程，亦皆由此引起。如果不是回國後很早轉任大學教育行政，我想個人還會對社會教育再作更多努力的。